

丁玲研究丛书

[美]梅仪慈 著
沈昭铿 严 锵 译

丁玲的小说

厦门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一位幸存的作家.....	(5)
第一章	主观性与文学.....	(35)
第二章	走向革命文学.....	(89)
第三章	延安与文学之应用.....	(149)
第四章	以文学作品反映历史的《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	(201)
结束语	对文学的责任感.....	(225)
译后记	(232)

前 言

我是在若干年前开始研究丁玲的。当时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听到丁玲的消息了，不知她是否健在。那时候我以为我能做的只不过是研究一下丁玲的许多著作而已。一九七九年六月，也就是我认为已经完成手稿的那个月，中国共产党正式为丁玲恢复了名誉。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丁玲本只是存在于“字里行间”，现在听到了这预料之外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即决意一定要去中国会见这位复活过来了的人。我终于获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来华访问，使这次会见得以实现。

我在中国逗留了六个月，从一九八一年三月到八月，在这段时间内，我不仅有幸与丁玲多次交谈，而且还在许多场合中，如她所说“看她表演”。我常常在她的家里见到她，她的丈夫与其他家人也都在场。她的丈夫陈明是她的真正的同志，他的支持对丁玲能持续她的创作生涯起着决定的作用。我还在座落福建海边鼓浪屿疗养所的一幢毗邻丁玲住处的房子里住了九天，那时丁玲正在那里避寒。这件事对我更是一种特殊的优待。最出我意外的乐事是我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日有机会和丁玲一起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去旅行一次，北大荒是丁玲下放苦渡十二年岁月的地方。在这个中国的特殊地区，尚在开垦中的东北边境，我有机会与许多认识丁玲并在她受苦的岁月里和丁玲一起劳动过的人们相见和交谈。

在这次旅行中，通过与她个人的相互交往，我才渐渐明白了为什么丁玲是今天中国最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作家之一，为什么这位吃苦受屈而经常表现出坚毅不拔精神的作家，在这个社会中成了一位具有如此崇高道德威望的人物。

但丁玲个人对政治局势变迁的具体反应则应皆由历史判断，不该归于文学评析的范畴，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探讨之主题。本书主要介绍丁玲的小说著作。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她总是非常乐意和藹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她一再精辟地强调指出，一部作品写成之后，批评和诠释应由旁人来作，而不能由作者本人代庖。在感到有用的时候，我会提及她某些小说写作的情况背景，但直到现在，我并未觉得因和她谈了话就必须怎样修改我的评析。当然，我也不能仅仅因和作者会过面就敢宣称自己的理解有什么特殊的权威性。

大部份丁玲小说都没有英译本。因此许多读者或不会直接知道她的小说，而我的研究又是注重细读作品的，因此我从丁玲的文章中摘录了大量的材料。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实践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要用另一种语言来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格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译文中尽可能保持原著的特色，即请读者读来艰涩聱牙也在所不惜。

我在文学评论上所作的这些尝试，比起我所研究的在内容与数量上都十分丰富的文学著作来，实在显得太不够了。如果没有许多学者和学术机关的协助，我的研究著作的内容还会显得更加贫乏。我要感谢帕特里克·哈南，詹姆士·罗伯特，海托埃，亨利·列文，凯尼斯·德·沃斯金和约翰·贝宁豪逊诸人，他们很耐心地读完了我的手稿，还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建议。我很高兴地提到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的万维

英和马惟一两位先生给我的大力协助。她们不惮辛劳地帮助我在他们的馆内和别的地方寻找资料。

这次我能在中国作六个月的访问，全靠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全国人文科学资金会的支持与经济援助。我非常感激这次访问的接待单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两个单位的同行为我安排了和作家与出版家的会见，替我联系参观各处图书馆，为我提供各种书籍和期刊，还给我解决了许多住宿和旅行上的困难。他们给了我慷慨无私的帮助。

我这次访华目的之一是要阅读丁玲写过的每篇作品，也包括那些曾在当时刊物或地方小报上发表过的不易搜集的短文在内。另一目的是要找寻那些丁玲小说作品首次刊登的杂志或报纸。现代中国作家在自己作品再版的时候，往往要对原版进行一番修订，因此，我打算把她的每部著作与原版文字对照一下。这件工作和另一件确定丁玲小说具体写作年月和写作次序的工作，对于我研究丁玲小说的演变发展，显得十分必要。我要由衷地感激下列图书馆的同志们，他们的大力协助，使我得以顺利进行上述的工作：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还有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图书室。而这些开列出来的馆名还不是大处着眼，事实上，还有各个馆内科室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曾群策群力地为我解决过某些文献目录上的问题。此外，我也无法具体开列出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名单，我曾和他们一起渡过我此生中一些最兴奋激动的时刻，大家共同讨论了各种问题，从丁玲小说中个别章节中的具体细节直到现代中国文学上的广泛问题。我必须向我们所讨论

的作家本人深表谢忱，正是出于探讨她的作品，我们才有这次聚首的机会。而且我要感谢这位作家，为了每个研究她著作的人从中所获得的丰富报偿。

我还要谢谢唐纳德·A·吉伯士。他送给我一幅丁玲的相片。

第三章的某些章节曾以另一标题《文学的应用：丁玲在延安》曾收入《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论集，一九七八年柏林会议的论文》(上)。编辑者为沃尔夫冈·库彬和鲁道夫·G·魏格纳(Bochum; (德文)Studienverlag an Brockmeyer, 一九八二)。承蒙他们同意我重印材料，特在此深表谢忱。

再就较狭小的私人角度说，我还要诚挚地感谢以下诸位，没有他们，这部书的写作不但不可能完成，或许至今仍未着手。他们包括我的父亲梅光迪，我写此书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他虽然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曾持坚决批判态度，但他和丁玲有着共同的观点，即坚信文学对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的母亲梅李今英，我的丈夫艾伯特·费维恺和我的两个孩子爱荪和保尔，我也怀着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他们或是对我的工作不时鼓励，或是对它的进度情有可原的显示不耐烦，这样使我终于最后完成了此书的写作。

费维恺·梅仪慈

密西根大学民用住房学院

1982年5月

导言 一位幸存的作家

丁玲的著作在中国被封禁了二十多年；她的名字从未被人说起，外界人士无法知道她的生死存亡。这些年来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这位最杰出和多产的女作家的存在和创作，竟一字不提。

丁玲于一九五八年成了被认为不存在的人。他因打成右派而被开除出党，同时下放到北大荒。经过二十一年，到了一九七九年六月，她被委任为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虽然这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机构，但这次委任却成了党撤消以往所作结论并为她正式恢复名誉的第一个公开信号。过去遭贬，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平反的作家当然不只丁玲一人。但她经过漫长岁月的销声匿迹再重现文坛，更显得富有戏剧性。同时这又是如此地显示了她的性格，并符合她生活的格调。因为丁玲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坚韧的幸存者，她历遭战争劫难、下放、监禁的折磨，然而她活下来了，而且她更是以一个富有创造性和实践精神的作家活着。丁玲一生饱受过去半个世纪来动荡政局带来的灾难，可她仍顽强坚持文学创作，只要形势许可，她就能适应风云变幻的创作环境，继续她的写作。

丁玲的文学活动到了反右运动时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沧桑。她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的，可说是五四一代人中的一个。她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并掌

管了一切文学事业以后。虽然许多别的五四作家也活到五十年代,但继续进行创作的人却寥寥无几。也有部分作家,象茅盾这样,在国家文化领导部门身膺高位,可是很难找到一个如丁玲这般受过热烈拥戴的作家,虽然她的荣誉只是昙花一现,不一会就冷落下来。一九五一年,她的描写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荣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姑且别论斯大林奖金本身能否看作是一种衡量最完善的美学作品的标尺,丁玲获得此奖,却是她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最高荣誉与创作声望的明证。

丁玲选定土改作为她作品主题一事主要表明,她从以描写青年女子在恋爱、情欲及争取平等权利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而首次震惊文坛之日起,至今是经历了一条多么漫长的思想道路。有些西方批评家认为,把丁玲的晚期作品与早期作品一比较,即可看出艺术性的减弱来。他们把这一现象归咎于政治任务无形地损害了艺术质量。这种论点曾在一部中国现代小说集的引言中隐隐出现过,在这部集子里选入了丁玲走上革命道路“以前”和“后来”创作的两篇小说,引言中写道,“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比较之下,小说《某夜》表明,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能对一位有才华作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可是丁玲在投身政治改造的时候,却仍是一个年轻且不十分成熟的艺术家。我们不能概括地说,这位有“才华的作家”于这三、四年创作初期写出的小说里就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了。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某种政治约束显而易见对于丁玲后来作品的影响。不管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丁玲毅然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刻,还是后来她服从于党的文艺政策的那些日

子，在丁玲的作品里，政治永远是一种明显地起着主导作用的因素，我们或许会幻想一下，如果丁玲的一生命运没有如此注定地要受制于政治事件，她的创作才华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可是历史却没给她留下多大的选择余地。事实上正是因为她的一贯坚持写作，尽管政治动荡与思想变革不断地限制着她的创作范围，才使她成为那么一位起示范作用的研究对象。我研究丁玲著作的第一个着眼点并不放在探讨美学水平与政治约束的关系那个复杂的问题上；我只从研究她著作的本身开始，即使政治在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我所要精细观察的是这位小说家的创作成就。

丁玲作品独特的地方正在于她对政治影响所作的反应如何在她的作品里显示出来。写作上的许多表现——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人物的构想，结构与因果关系的安排，比喻与背景的使用，语言风格及文体的选用，还有叙述方式的确定——这些都反映出丁玲前后思想发展的过程。她在创作上出现的变化，如同她一生中所遇到的一些重大事件一般。她所创作的那些文学作品，也从各方面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创作上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因此，这部研究著作的重点是放在丁玲的小说如何经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它如何展示意识形态影响创作实践的各种途径。

由于在历史上与个人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一些特殊事件，加上丁玲在时代潮流中心形成的个性与气质的因素，才使她成为如今这样的作家。当她在工作与生活上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时，往往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对她作品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她的体验范围也十分广阔，可是这些方面我们却只能获得极少的一点具体资料。在中国究竟哪位现代作家（除鲁

迅外，能成为文艺界长期引人注目的人物，往往是争议不下的。以丁玲为例，一部象样的传记须待她被卷入的政治论争澄清后才可能出现。我们只能从各种迥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搜集一点有关她的材料，并且其中各还掺杂着许多偏见与局限。介绍丁玲早年生活的最全面的材料⁽²⁾是她通过口译亲口告诉一九三七年访问延安的海伦·斯诺的。写青年作家丁玲回忆录的作者是一些悼念她的朋友，这些人当时也是以自己的饶舌闲谈吸引读者——尤其在丁玲于一九三三年被捕且传闻已被处死的那个时候⁽³⁾。延安生活（一九三六——一九四六）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外国记者的访问记录。在外国记者的眼里，丁玲是位非采访不可的名人⁽⁴⁾。接着便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粗暴攻讦，以及长达二十年的销声匿迹。平反之后，在记者的采访录中，也没对她在下放与监狱渡过的廿年岁月提供什么令人满意的资料。她在一九七九年以来写成的散文都是一些怀念故交旧好的回忆录与悼念文章，这些故友都是她在平反后才获悉他们去世的。散文内偶而也有一些谈及她本人的文字。现在下面这短短的传略，只是打算为分析丁玲在各个阶段写成的小说提供一个轮廓。至于她一生中所遇的各种事件详情，则留待到讨论她的作品时，视具体情况再行补充。

关于丁玲的生辰，曾有不同的说法，近年来才定是在一九〇四年⁽⁵⁾。可是她的诞生地却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地方意义重大，她是湖南省人，湖南是许多中国革命领袖的故乡。她原名蒋冰之，丁玲是她后来取的笔名。当时，她在临澧县的那个曾是十分富裕的望族家庭已经迅速破落，象很多别的这类家庭一样，产生了一代败家子。丁玲的父亲便是

其中一个，早年，他曾在日本学过法律，但是回国之后却把这些国外学得的知识派上用场。他去时丁玲还只有三岁，后来女儿回忆中的父亲爱好骏马，性情豪爽。丁玲的母亲对丁玲的生平有着更重要的影响。她可以算是革命前一代出色母亲中的杰出代表，这样的母亲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先行者们的传记中是屡见不鲜的。正是这些母亲鼓舞与推动了她们那些尽管是在传统家庭中长大、但却极为出色的孩子坚决地与过去决裂。

她的丈夫死后留给她一身债务，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孩。蒋夫人返回故乡常德并毅然决然地去一所新办的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她在长沙读了几年书后便开始教书的生涯，先在桃源县一所小学执教，后来又回到常德。丁玲的弟弟生来素质孱弱，在举家返回常德之后不久便夭折了。丁玲跟着母亲，不时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读书，有个时期她还住在一位母舅的家里。在那儿她发现了一个堆满古书与各种外国小说译本的小阁楼，于是她便专心致志地阅读起这些书来，借以打发孤寂无聊的日子。（6）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小小的桃源县，丁玲很快被卷了进去，她加入学生示威游行，发表演讲，参加集会，满怀激情地仿效剪发女子，毅然剪去头上的辫子，她便成了许多人蔑视嘲笑的对象。她还在贫民夜校里教书，那时她的个头比讲台才高出一点，因此人家都叫她“崽崽先生”（7）。

一九一九年，丁玲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教她语文的老师被大家看作“神圣的人物”。他从鼓吹文学革命的杂志《新青年》上摘录文章来作教材，并向学生介绍现代中国

文学和许多外国的作家。丁玲后来回忆说：都德《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二渔夫》都是她当时最喜欢的小说(8)。这位老师还鼓励丁玲写作。她的两首诗被刊登在他主编的一份地方报纸上，她“看到这些诗登在报上，兴奋之情不可言状，竟使她夜不能寐，(9)后来约翰·杜威与伯兴特·罗素两位学者路过长沙，丁玲也去听过他们的演说，只是他们并未给丁玲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10)。丁玲此时虽然年纪尚轻，但这个早熟的活动分子却已在向湖南省议会开展的争取妇女平等及财产继承权的激烈的示威斗争中担负起领导全校的职责了(11)。

翌年，丁玲和其他五名同学（其中一个杨开慧，后来成了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一起进入了岳云男中，这个男女同校的大胆创举一时使整个省城群议哗然，可是她旋即放弃了这一继续留在男校求学的打算，而迈出更激进的一步——离家远走上海，到平民女校去读书，该校由茅盾、李达、陈独秀、刘少奇和别的左翼知识分子创办，与此同时，她在母亲的支持下，坚决拒绝向一家之长的舅舅的压力低头，解除了和她表兄的婚约。她发表了一篇含沙射影地骂他舅父的文章，文中把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骂了个痛快。这是她“第一次感到笔杆的威力”。这回丁玲受到家庭更加激烈的反对，她便“象个流放的叛逆分子”(12)与同班同学王剑虹结伴去了上海。此时，年方十六的丁玲的生活主题已是十分鲜明了：反抗传统，男女平等，积极参政，醉心文学。

过了不久，丁玲又开始对上海平民女校感到不满，于是这两位朋友决心走自学道路，她断断续续地学点文学与绘画，并和无政府主义派的人物交往接触，总的说来，过着一

种既贫困却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南京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丁玲进入了上海大学中文系，她特别喜欢听茅盾讲《奥德赛》和《伊里亚特》，可她的最好老师是瞿秋白，一位刚从苏联返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丁玲和他谈论文学与社会，“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不涉及。为了帮助丁玲能很快地欣赏普希金的优美语言，瞿秋白教她阅读普诗原文。王剑虹在一九二四年初与瞿秋白结婚，可是婚后不久她便得了肺结核病死了。(13)

丁玲决定去投考北京大学，可惜到北京时入学考试已经举行过了。她在鲁迅先生教的班上旁听并继续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不久她认识了胡也频，一位在奋斗中的青年诗人，一位“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14)很快他们就同居了。沈从文在他所作《记丁玲》一书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细腻生动、几乎是田园式的生活图，从中可以看出，他这两位朋友在北京郊外西山过着的贫困但青春初恋又充满着文学抱负的生活。这本书的作者沈从文也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在书中告诉我们丁玲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〇这个时期的一般生活情况，特别是她决心当作家这个思想的发展过程。

当两位敢于和现实搏斗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和胡也频正在向往和谈论创办自己的杂志及摆脱那些无情的出版商的控制的时候，丁玲起先只把自己看成他们事业的资助者，在杂志社里当个会计员或校对员。为了谋生，她曾经试图应征去做家庭女教师或私人秘书，可一会儿她又产生了个奇怪的念头，起初大家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呢：她要到上海去当电影明星，“频，你文章写不成了……等到你写成一本书，且有书

店愿意替你付印这本书时，我一定已经成明星了”。(15) 丁玲要进入电影界的计划归于失败，但她却把这一失败转化成文学上的成功：这次从影希望的幻灭成了她完成第一部小说的基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梦珂》发表了，小说讲的是一个纯洁、敏感的少女怎样在当了电影明星之后成为这个腐败罪恶社会的牺牲品。这部小说的出版是这位当时不知名作家文学生涯的一个光辉开端。数月以后，随着《莎菲女士的日记》（对一位患着肺病、神经质的年轻女子的矛盾心理的空前坦率的写照）的问世，丁玲已顺利地走上了成名的道路，成了当代中国最负声望（但在某些人的眼中也是最荒唐下流）的女作家之一。

但中国当时文学生活的中心已自北京移向别处了。一九二八年春天，根据丁玲后来的回忆，“我们都……到上海去了……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16) 三个同伴，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出版了两份杂志，但很快便停刊了，这只是一种“很浪漫的冒险行为”(17) 他们还想自己兼当发行人。在他们出版的第一本书，胡也频诗选(内含廿二首)的前言中，丁玲谈到他们创办的红黑出版社是“我们自己几个又穷又呆，为了忍下许多市侩的气，将生活费节省下来的一个想纠正这唯利是图的社会的出版机关”(18)。其实一些聪明人已在哂笑他们把出版的第一本书弄成诗集的蠢举。起初，他们乘车上街浏览陈列在书店橱窗里的自编杂志，的确颇为兴奋，可光凭改革家的激情和文学的理想主义是不足以维持那庞大的出版开支的。不到一年时间，这些出版企业都倒闭了，带给那几个年轻人的只是债务的重担。(19) 有一段时间，胡也频曾在山东济南弄到一个教书的职位，但不久便因思

想激进与当局闹起别扭，被迫迅速返回上海。当时国民党对作家的迫害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学上的激进潮流都在迅速发展。在上海，由于有外国租界，且国民党的警方力量总的说来也较无能，因此政治反抗势力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胡也频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时便加入了。他成了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丁玲此时本身“把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看”。(20)胡也频“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21)胡也频外出开会时，她呆在家里写一些描写爱情与革命矛盾的小说。她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出生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胡也频告诉丁玲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并当选为出席二月在江西召开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他动身的前几天，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东方旅馆参加一个党会时突然被捕。虽然出事的根由至今仍未基本查明，但据推测，这是由于党内有人把会议情况向国民党警方告密所致。(22)后来胡也频于二月七日同二十三、四个被扣上共产党罪名的青年一起，被枪杀于龙华监狱。这次集体屠杀的暴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抗议。那五位烈士（被杀害人中还有另外四位青年作家）最快就成了文学界抗暴史上最有力的代表人物。

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曾对事变后的那几个寂寞惨痛的日子作过详细的描述。丁玲惊悉胡也频被捕的噩耗之后，不得不怀抱两个月的婴儿到别处藏身，在这种非常危险的境遇中，她多方拼命进行营救。起先，她根本无法得知胡也频的确切拘留处。后来胡也频费尽心机给沈从文捎来一个

消息，至此，她才得以知道他的情况。可是他们还得给送信人一笔可观的酬金。这个送信的狱吏后来还告诉他们有关探监的手续。到了指定的日子，沈从文陪伴丁玲来到龙华监狱。丁玲手里挽着一个为丈夫准备替换衣服与食物的包袱，她穿着一件短短的灰布棉上衣，“同一个在吴淞丝厂做每天值贰角八分钱工的乡下女子完全一样。”（23）

他们从清晨起一直伫立在寒风之中，周围是六百个别的志愿探监者，他们都焦急地等候着看谁可以登记名字，谁可以最后获准进入监狱。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她才得以穿过多重牢门和岗哨，来到一群等候在里面的探监者的身边。可他们仍未得到探狱的许可证。一位典狱长告诉他们，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不妨给犯人送点钱”，这样他们可望在胡也频经过的时候，远远地看他几眼。他们听到从房间另一端的小铁门内传出一阵镣铐银铛的声音，丁玲马上喊出他的名字来，胡也频停下脚步，带着手铐的双手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接着便迅速消失在铁门后面。他的死讯直到被处决若干天之后才传出来。

在这些骇人的日子里，沈从文印象最深的是丁玲的坚强。听到了胡也频的确凿死讯后，“她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24）“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但在最伤心的日子里，她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的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25）

丁玲为了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与谋生，决定采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把孩子送到湖南老家，托付给母亲照应。沈从文陪同她返回故乡，路上走了三天。一路上他提心吊胆，深怕丁玲会受不了假装胡也频仍生活在上海的精神压抑，最后失去

了自制能力。为了不让老外婆知道惨事的真象，丁玲不得不含泪强装欢颜。

丈夫的牺牲更坚定了丁玲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回到上海之后，她更加积极地参加左联的活动，并担任了文学杂志《北斗》的编辑。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出版的第一期杂志上，开始刊登了丁玲小说《水》的长篇连载。小说描写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时期苦难的生活怎样迫使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许多党的批评家都把这部小说誉为新的无产阶级小说中具有里程碑作用的作品。它说明丁玲在创作主题及创作技巧上已有了全新的突破。丁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了共产党。

因为《北斗》是当时许多无法长期维持的左派杂志中的佼佼者，它便经受了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骚扰迫害，在出了七期之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被勒令停刊。丁玲当时隐居在外国租界继续写作。她着手写一部以她母亲生平作为素材的小说，但在小说约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她便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在自己的寓所中被国民党特务强行绑架，她后来说，她怀疑那时候和她住在一起的冯达是出卖她的人。可在这次绑架中冯达所起的作用和她被拘禁的前因后果，至今仍未能知其详。(26)关于她已被处决的传闻一时激起出版界争着出版回忆录、纪念文学与赞颂文章及她的作品的新选集。这样便更提高了她的声望。她被警方押往南京并在不时更换拘禁场所的情况下苦渡了三年光阴。她的第二个孩子，也即是她的女儿，便是在那时诞生的。后来冯达患肺病十分严重，丁玲的母亲还搬来与女儿同住。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软禁丁玲主要是为了诱说她与共产党决裂，并用她的才华来为国民党效